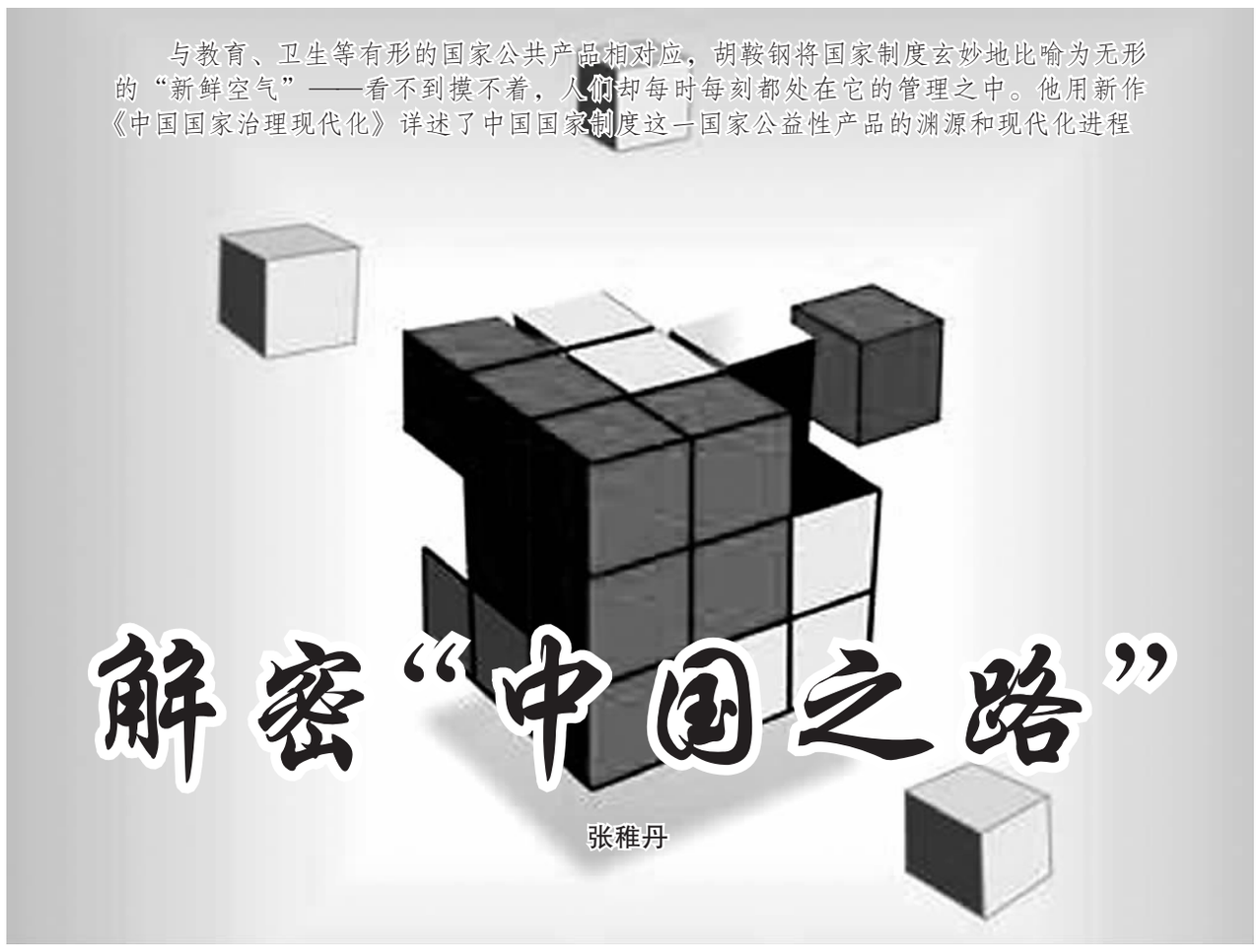


与教育、卫生等有形的国家公共产品相对应，胡鞍钢将国家制度玄妙地比喻为无形的“新鲜空气”——看不到摸不着，人们却每时每刻都处在它的管理之中。他用新作《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详述了中国国家制度这一国家公益性产品的渊源和现代化进程

解密“中国之路”

张稚丹

今年2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专题班宣讲国家治理现代化，半年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率领几个青年学者拿出了新作《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他说，西方讨论国家治理从来不用现代化的说法，因为它就是现代化，但中国不同，必须与国家的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赶超并创新一种新的现代化的道路。

“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坚固的团体”先一体后多元的中国国家制度

1924年，孙中山将旧中国归纳为“个人自由，四分五裂，一盘散沙”，指出“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

正因如此，毛泽东创立新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央决策权集中，统一财政经济体制，人民解放军统一建制和军事指挥，地方政府均服从于中央政府，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责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的单一制国家，而非苏联采用的多民族联邦制，各加盟共和国为主权国家，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为了强调一元化领导，中国不搞两院制，政协不是上院。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确立了三项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起“一体多元”的现代国家。

这种体制让中国能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举全国之力，发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但这种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和个人决策机制的天然缺陷，也导致了“大跃进”、“四清”、“文革”等一系列运动，中国经济也随之多次大起大落。胡鞍钢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在制度，而在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过程中的政策失误。

中国国家治理绩效优于美国表明“中国之路”优于“西方之路”

胡鞍钢认为，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既没走传统教条式的老路；也没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模仿和转向“西方之路”；而是经过中央内部和平的政治博弈后，独辟蹊径开创了“中国之路”，以渐进方式改革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对外全面开放，中国由此崛起。

作为弥补和完善，中国重建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1980年恢复1956年中共八届党中央领导体制，形成了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个层次的中央领导体制，在中央内部起到分权和制约的作用；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实行任期保障制度，加快新老交替；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重申依据宪法治国；重建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协商制度及其他机构。

1993年，胡鞍钢和王绍光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提出：国家能力是国家（指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包括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而国家制度的现代化，一是制度体系更加完备、成熟、定型，二是制度执行能够更加有效、透明、公平。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国家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分权过程，把土地种植权还给农民，经济适度由市场调节，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两只手（计划和市场）做事、两条腿（国企和民营）走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国家的本质竞争是制度竞争。“中国之路”在经济建设方面显示了巨大的优势。1990年，还处在苏联体系中的俄罗斯GDP占世界总量的2.4%，高于当时中国的1.6%。到2011年，俄罗斯为2.7%，中国已达到10.4%。

中国拥有近6000万家中小企业，大大超过美国的500万家和28国组成的欧盟的2070万家。2009年，中国商品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2013年出口额相当于美国的140%。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计算的GDP，今年底中国有望超过美国。

中国的体制总能帮忙实现改革目标。中国已有1.1万公里高铁，而奥巴马高铁梦至今连一寸高铁都没实现。当今美国最大改革的奥巴马医改法案，也因无法形成社会共识而打折变形。

制度自信不能变成制度迷信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

在专门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从学理角度围绕国家治理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树军副教授将国家治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切分为两个目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全世界共同的问题。中国有这样一个先进性的团体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探索出一条中国道路，不仅传承发扬中国文明，还可为人类做出贡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笑言：胡鞍钢真是每次都能赶上最前沿、最重要的事来做，之前他最先为遇到攻击的中国制度辩护，讲出制度的优越性；在谈到国家治理的时候又最先加以研究，然后迅速出书。潘维提醒说，不能把制度当做一劳永逸的永动机，制度自信不能变成制度迷信。国家治理还牵涉到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诸多方面。在政府和市场之外，需要有个动态第三方以达成平衡，这就是普通大众的幸福。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李玲教授说：中国制度这个大厦建好后，要考虑怎么让这个大厦能够住得舒服，越来越多的人都有合适的空间。社会问题不是光凭市场能够解决的，该政府管的还得政府管。一个人看病全家穷。医疗服务体系不能总走在创收的路上。另外，基层优秀人才上升空间很小，很多社会矛盾说明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白钢副教授指出：正因为中国国家制度的一切优越之处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具有高度政治主体性的党的存在，那么就要预防政党主体性的丧失或被削弱。当党不再代表全体人民利益，不再始终保持革命理想和革命信念，而是作为一个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表参与博弈，那么国家制度的所有优越性都将不复存在。

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回忆上次跟着胡老师写《人间正道》的时候，王绍光老师说，我们讲“三个代表”，不能搞成只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不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完善制度的时候，要避免党丧失发展经济、为人民服务和塑造信仰的能力。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中国成就与儒学密不可分

2014年9月24日上午，在孔子诞辰2565年纪念大会上，两任秘鲁总统、拉美重要政治家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将他的新作《儒学与全球化》中文版（人民出版社出版）赠送给习近平主席。

佩雷斯幼年就好奇于秘鲁当地华人特殊的生存思维方式，他们对痛苦的不同感受、对高兴的不同表达。1983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有天晚上，邓小平向他描述中国今后20年的路径，当时他非常不解，现在看来都已经实现了。

他认为，最近30年，世界经历了两大发展进程，一是全球化，二是中国以杰出主体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可以从与西方思想和态度相当不同的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中得到解释。而这种“存在方式”之形成，则有赖于传统儒学的塑造和培育。他将中国的飞速发展归结为中国具有一种“基本人格”。中国人在2500年前已与西方分道扬镳，始终与自然、现实和谐相处。该书已在多国发行。（张　三）

在孔子故里歌唱

抒情诗集《我在孔子故里歌唱》（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作者黄亚洲系中国诗人、中国“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集共收录诗作45首，以中英文双语出版，由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主任、著名翻译家北塔教授翻译。

这是由山东曲阜的“孔子艺术家协会”2014年精心组织编写的一部全面描写、反映曲阜历史文化古迹、自然景观、当代风貌的现代抒情诗选。作品艺术而生动地阐发了东方儒家哲学的深厚内涵，诗风兼备凝重与纤丽，欣赏兼顾阅读与朗诵，出版后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孔　雪）

众筹——网络与出版交集新看点

齐　冬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红尘，曾任职某杂志主编10年，在美国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做高级访问学者1年。身为资深背包客，她曾多次为国家地理杂志供稿，出版了“异域行走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包括《在路上：美国大学生活图本》、《尼泊尔的香气》、《印度瑜伽圣地密码》、《越野越西藏》、《越野越新疆》等，其中，《越野越西藏》曾获“百本旅人最爱图书奖”。

最近，当她推出新书《徒步喜马拉雅极地与你相遇》时，她的出版公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却别出心裁地在众筹网站上发起了为她的新书筹集2万元出版资金的在线活动。短短数十日，这本书就完成了预定筹资目标，众多网友还在活动页面写下了对作者的祝福和对新书的期待。

“众筹”是一个舶来词，翻译自英文crowdfunding一词，即大众筹资或群众筹资，本义是利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传播的特性，让个人或小企业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创意以争取关注和支持，通过对产品或者服务团购和预购的形式，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援助。近几年国外众筹网站兴起，据《福布斯》数据，2013年全球众筹产业已达到51亿美元。

然而如今，它已成为国内出版业高管们研究的热门词汇。国内著名众筹网站众筹网的出版合伙人黎耀辉已在出版行业供职多年，近一两年见证了不少国内众筹出书的成功案例。

7月10日，在360公司董事长兼CEO周鸿祎的个人第一本亲笔著作《周鸿祎自述：我的互联网方法论》出版前一个月，中信出版社联合京东众筹和360公司策划了该书首发众筹项目，参与众筹不仅能第一时间获取新书，还能获得与周鸿祎当面交流的机会。最终，该书不仅成为京东众筹上线以来第一个超过百万的项目，还以近124万元的众筹金额刷新了图书行业的众筹纪录。

此前不久，机械工业出版社和华章图书联手打造的《众筹——传统融资模式颠覆与创新》一书，还未印刷前就登录众筹网进行筹资，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共筹资到8万多元资金。

最令黎耀辉印象深刻的案例来自去年一本名为《社交红利》的书，该书在首次印刷前即通过众筹方式募集到10万元书款。更重要的是，通过众筹，该书尚未开印，就在两周内卖出3300多册，出版一个月后三次加印，卖出5万多册。“当时我的微信朋友圈、微博全部都是关于《社交红利》众筹新闻的帖子。那本书出版社并没有做太多的宣传和推广，但是众筹这件事给它带来了巨大的媒体关注和社会影响力，这比众筹了10万元出版资金还值。”黎耀辉说。

除了宣传效应，对出版业来说，众筹出版还有诸多显而易见的优势。

出版业长期以来都是精英式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模式——不管是作者主动来稿，还是编辑约稿，一本书能否出版以及如何出版、何时出版，很多情况下取决于出版社编辑们的喜好、策划能力和判断力，而图书出版发行过程中的一系列市场推广活动，也往往由出版社操刀，这其中容易出现判断失误或者滥竽充数的情况。众筹出版模式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上将选择哪本图书出版的权限赋予了普通人——普通作者或普通读者。只要某本书或出版项目引起了众筹网站网友的关注，网友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通过网络为其投资资金，最终促成成功，哪怕作者本身一文不名。

今年三四月，居住在上海的律师蔡正华通过“沪法网”和“博和刑事”两个平台向好友推送法律时评，多篇文档单平台阅读量过万。恰巧他的妻子怀孕了，他希望将自己的这些法律评论流传下去，启发包括自己的子女在内的下一代人。半个多月前，蔡正华在某众筹网站上为自己的法律时评集发起了一个60天之内筹集3万元人民币的项目。像众多众筹出版项目一样，蔡正华设定了不同档位的投资额度，100元、300元、500元，不同的投资额度对应不同数量的签名图书和上海市中心某咖啡店的读书俱乐部会员活动、法律咨询，投资1000元可与蔡正华共进晚餐。离10月21日之期还有42天，他已经筹集到了2.74万元人民币，完成预定目标的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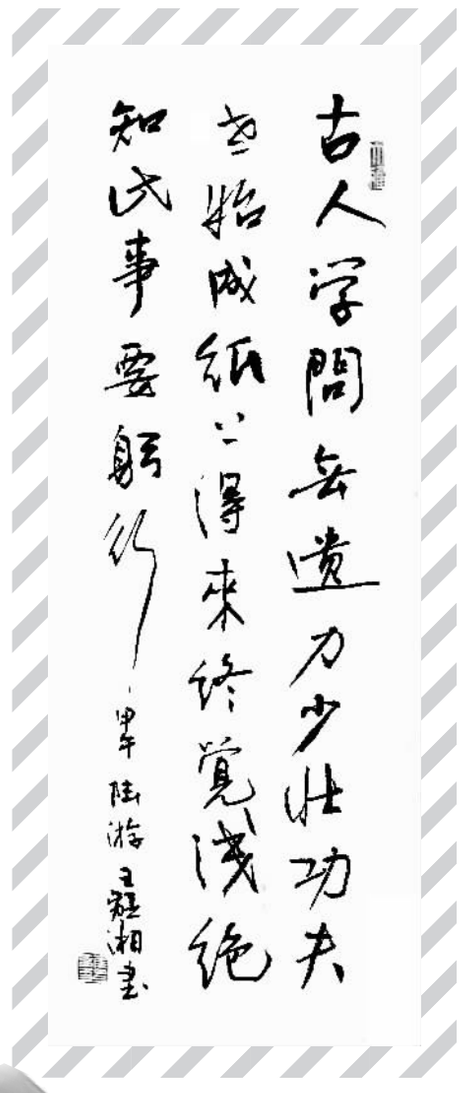
另外，出版社还可以通过某本书在众筹网站上激起的反应，预测这本书的受欢迎程度，从而合理安排首印册数，规避风险。

“本质上书是价值载体，从整体而言，众筹并不能改变图书出版的难易程度，但是眼下图书市场越来越细化，一本书既然能够获得众筹支持，至少表明出版它不是盲目出版。”北京时代华语图书有限公司副总裁刘杰辉说。

爱书妙语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陆游**诗　**王离湘**书



书法家简介　王离湘，笔名罗思玎，河北滦南人。1980至1985年在新疆军区服兵役任教师，现任河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爱好文学艺术，著有散文集《思想的跫音》，小说集《等待地震》，主编《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与探索》，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自幼喜爱书法，博采众长，师古不泥，追求书法的流变与升华。重视理论研究，发表过《中国书法艺术生命力研究》和《中国书法文化学与哲学问题研究》等理论文章，寻求中国书法理论的创新途径。现担任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河北省中国书法院院长等社会职务。

父女考索石鼓文

《石鼓文考索》（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篆书家王永明和其女儿、书法学硕士王哲历时十多年共同撰写完成。该书首次从文学、史学、古文字学、书法学、工艺美术学等多学科入手，对石鼓文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又缜密的探析，澄清了石鼓研究领域的诸多误区。尤其是对石鼓为战国秦惠文王时期制作的论定，获得著名古文字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高明先生首肯，认为王氏的研究“言之有据，翔实可信”。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远　晴）

一座桥和一个人的传奇

作家剑钧创作的长篇传记文学《守桥翁的中国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的主人公郭景兴是国内著名的抗日战争史学家和书法家，是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首任筹建处主任和创建者之一。他是蓟运河边的一个苦孩子，追逐梦想，一路坎坷走到了卢沟桥，做起了“守桥翁”，演绎了“一座桥，一座城和一个人”的故事。他30年如一日，寻访抗战老兵，著书立说，还原了卢沟桥事变那段真实的历史。他离休后献身公益，耄耋之年又去实现捐款1000万元的公益梦想，书写了人生传奇……作者以七七事变和卢沟桥、宛平城为历史背景，历时一年多跟踪采访了主人公和相关部门和人士，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抗战史实，展示了一个革命老人的大爱情怀和一个“守桥翁”的中国梦！

（潘衍习）